

中国近百年历史与现实

纵 横 谈

主编 刘少清
叶春大
牛广和

海潮出版社

前　　言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关于要加强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学习的指示，使历史教学更好地贴近时代的发展脉搏，跟上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从历史的角度科学地回答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以增强史学教学的时代感，提高史学的教育功能，特此编写了《中国近百年历史与现实纵横谈》一书。旨在给中国革命史教学提供一本锐意改革的辅助教材，也为部队官兵和地方广大青少年提供学习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知识读物。

《中国近百年历史与现实纵横谈》一书的编写，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党的十四大精神为依据，本着学习历史为现实服务的原则，通过有关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的纵横比较，在加深了解和掌握有关历史问题的同时，做到正确认识和科学地理解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有关的现实问题，使历史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一把钥匙，从中达到学史明志的目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生事物不断涌现。如大量地引进外资、土地出租、建立特区和保税区等。对此，社会上有许多人不甚理解，甚至有些人把上述问题同历史上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建立租界地，开放通商口岸等混为一谈。既不明白历史，又对现实问题产生困惑。这就给历史教学提出一个亟待解决的新问题，那就是历史教学必须面对

现实，服务于现实。即坚持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指导教学，在历史同现实的结合上去说明问题，解决问题，使历史教学富有时代感。否则，历史教学就失去了它固有的生命力。《中国近百年历史与现实纵横谈》一书，它通过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的比较，在加深了解历史问题的同时，做到科学地说明现实，把学习历史同解决现实问题融为一体，它体现了历史教学改革的方向，是当前深化史学教学改革的一个尝试。

《中国近百年历史与现实纵横谈》一书，是近百年史的内容序列，选择与现实问题有关的历史问题，采取历史与现实纵横谈的形式，在介绍历史问题的同时，用对照比较的手法说明有关的现实问题。为了更好地从历史同现实的结合上说明问题，我们通常是先历史、后现实；先史实、后结论。力求做到史实阐述准确，问题分析透彻，今昔比较客观，结论概括科学。本书语言朴实，通俗易懂，基本史实介绍较为完整具体，富有很强的知识性，愿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读。

《中国近百年历史与现实纵横谈》一书，虽然在内容体系上是一种创新，但毕竟是第一次尝试，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经验不足，难免存在某些缺点错误，诚望史学界同行和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目 录

前 言	(1)
近代的闭关自守与当今的对外开放	(1)
近代的思想启蒙运动与本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	(11)
近代的“改良”与当代的改革	(20)
近代资产阶级倡导的“天赋人权”与当代社会主义 的人权观	(29)
近代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共产 党主张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37)
近代改良派提出的“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理想	(45)
近代的领土租借与当代土地出租	(54)
近代的租界与当代的特区	(61)
割让香港与1997年收复香港	(69)
近代的买办与今天的外商代理人	(75)
近代的片面最惠国待遇与现代的最惠国待遇	(83)
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与当代的吸收和借鉴外 国一切先进的东西	(88)
清末知识分子的留学潮与今天的留学热	(96)
洋务派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与当代发展现代科技与 国防工业	(105)
科学救国与科技兴国	(112)
近代日本侵华与当代中日邦交正常化	(121)

近代帝国主义资本输出与当代引进利用外资	(129)
近代的自然经济与当代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139)
近代的“重农抑商”与当代的重农扶商	(145)
近代的通商口岸与当今的沿海开放城市	(153)
近代的“协定关税”与当代的关税自主和关贸总协定	(159)
近代帝国主义在华争夺筑路权与当代允许外国在中国兴办合资、独资铁路	(166)
旧中国的“公债”与当今的国库券	(175)
解放前的雇工制度与当今实行的合同工制度	(181)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188)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与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	(196)
民主革命道路的开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开辟	(204)
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三次“左”倾与“文化大革命”的“左”倾严重错误	(213)
井冈山精神与当代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	(221)
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与共产主义的道德观	(232)
遵义会议与十一届三中全会	(243)
中国共产党的“七大”与“十四大”	(251)
解放战争时期出现的资产阶级中间路线与当代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	(261)
建国后实行的计划经济与当今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70)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当今主张发展	
城乡私营经济 (277)
农业合作化运动与当前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 (286)
五十年代的“大跃进”与“十四大”提出的“加快	
经济建设步伐，争取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294)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当代的继承和发展 (303)

近代的闭关自守与当今的 对外开放

闭关自守和对外开放，这是一个国家两种截然相反的对外政策。在我国，从近代的闭关自守到当今的对外开放，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时间。在这漫长的二百多年的时间里，伴随着这两种对外政策的实施，古老的中国经历了由盛到衰、由落后到追赶先进的两个时期。这二百多年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了，闭关自守使中国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而对外开放则使中国正迎头赶上世界先进发达国家。

我国近代的闭关自守政策，就是指清政府限制和禁止对外交通和贸易的政策。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以“民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为由，关闭漳州、宁波、云台山（今连云港）三口，仅留广州一口对外通商。这是近代清朝政府正式闭关的开始。

清王朝推行闭关自守政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限制贸易口岸并设立海关和公行制度严加管束。清政府封闭江、浙、闽三关，限定广州一口为通商口岸，并由粤海关管理。清政府及海关不直接与外商发生关系，而是通过“公行”来办。“公行”是经清政府特许，垄断进出口贸易，兼有商务和外交两种性质的特殊机构。公行商人一方面垄断对外贸易，另一方面则对清政府承担一定的义务，如

担保外商缴纳税饷、规礼，负责约束外人在广州的起居行动，充当清政府与外商间一切交涉的中间人等。

第二，限制外商的居住和行动。清政府从1759年到1831年先后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民夷交易章程》、《防范夷人章程》等，对外国人的商务活动、居住处所、行动自由等，都作了苛刻而繁杂的规定。

第三，对贸易货物及文化交往进行严格的限制。清政府对中外贸易货物的品种和数量有严格的限制性规定：粮食、铁和铁器、硫磺、硝等严禁出口；丝和丝织品、茶叶、大黄的出口量严格限制；中国书籍包括史书等禁止出口；禁止中国人教授外国人汉文，违者按“汉奸”捉拿治罪。

第四，限制中国商民出入海疆。清政府对出海贸易的商民及与洋船交易人员采取歧视、限制的政策，动辄逮捕审讯，甚至无端加以“私通外番”的罪名，予以处死。为限制商民出海，清政府还限制商人制造海船，不仅对海船的桅杆、梁头、载重、舵手人数都作了严格的规定，并且严禁租船，严禁在外国打造船只带回国内。

从清政府闭关政策的内容上看，它并不是完全禁止中外贸易，而是力图将其限制在一个由朝廷控制的狭小范围内，同时竭力阻止中国民间的对外商业和文化往来。这种闭关政策一直延续到《南京条约》的签订。

那么，清政府为什么要实行闭关政策呢？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它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产物。在当时的自然经济条件下，连国内市场的商品交换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何谈广泛的对外贸易呢！封建统治者感到对外贸易可有可

无。这是实行闭关政策的经济基础。

第二，它是清政府“自卫”的一种手段。采取这种自卫手段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初到中国时，就充分暴露出它们的海盗习性，在东南沿海一带烧杀淫掠，强占土地，无恶不做。此外，在来华的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又往往为争夺在华利益而发生纠纷，甚至互相火并，侵犯了中国主权，扰乱了沿海一带的秩序。所有这些都使清政府不能不进行自卫。

第三，它是清朝统治者妄自尊大心理的反映。长期以来，清政府对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视而不见，又骄傲自大。在对外关系上养成了一种虚骄心理，认为自己是天朝大国，别人都是夷狄蛮貊；对外国使者来中国，认为是输诚向化，万方来朝；把外国商人来中国经商看作是向中国“臣服”、“朝贡”。这种传统的陋见，对统治中国的满族贵族来说更有某种特殊微妙的政治需要，所以要特别坚持。这就是清王朝实行闭关政策的思想基础。

第四，它的最根本的目的是隔绝人民与外界的联系，以利于专制统治。清朝是满族贵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封建王朝，在阶级压迫的同时，实行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民族压迫。清朝贵族获得全中国统治权力的历史和人民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现实，使他们特别惧怕“内匪”与“外夷”的结合。实行闭关政策就隔断了海外与国内人民的接触。这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对广大人民的猜忌心理。

闭关政策在当时西方殖民主义进攻中国的特殊条件下，具有一定的抵御外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侵略的自卫性质，但闭关政策毕竟是一种反动的、落后的政策，它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首先，它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明朝末年，我国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与西欧相比并不十分落后。但是，对于开展海外贸易，开辟海外市场，西欧先进国家采取了鼓励政策，而清朝政府则采取了闭关政策。统治者不仅迫害出海商民和华侨，还限制出口货物的种类和数量，从而使中国不仅无法开拓海外市场，而且使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商业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也受到了严重打击。与此同时，清政府对外国工业品也一概斥之为“奇技淫巧”，加以鄙视。这种畏新排外的盲目自大，严重地压抑了本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阻碍了国内生产力的发展，加大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

其次，阻碍了中国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阻碍了社会的进步。资本主义浪潮把整个世界联成一个整体。但是闭关政策阻碍了中国了解世界，走向世界，把中国同世界的历史潮流相隔绝，助长了愚昧无知狂妄自大的心理，以至从不睁眼看世界，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茫然无知，把西方的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津津乐道于外国落后、天朝完美至上的欺人之谈，其结果是造成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全面落后，同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

再次，它不仅不能防范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反而给中国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从表面上看来，闭关政策似乎也限制了外国侵略者的活动，具有一定的自卫作用。实际上，这种被动、消极的政策只能束缚中国人民，不能限制穷凶极恶的外国侵略者，对国家和民族有百害而无一利。在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八十五年历史中，可以说没有一项起过防范侵略的作用。如广州一口通商，虽然从地域上限制了外商的

贸易范围，但中外之间的贸易没有因此受到削弱，相反引起走私猖獗，尤其是鸦片走私严重，使广州及其周围地区成了全国最大的贩毒基地。总之，这种政策既不能改变侵略者的本性，也不能妨碍侵略国家力量的增长，只能作茧自缚，阻碍国家的发展，扼杀民族的进取精神，是一种慢性自杀政策。

总而言之，从社会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个使中国人民与世隔绝，安于现状的闭关自守政策，本质上是保守的、落后的、反动的。这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作法，不利于中国人民了解世界、走向世界，更不利于我们学习世界各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其结果是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力日衰，也使封建统治阶级日益腐朽，苟且因循，无所作为。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我们总结了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闭关自守。”

在我国近代屈辱的历史中，也曾出现过所谓的对外开放。1840年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用大炮和刺刀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中国对外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这种“门户开放”政策与对外开放是有本质区别的。它是帝国主义为了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掠夺资源，倾销商品，榨取高额垄断利润而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其结果不仅使外国资本主义得以对中国进行大肆掠夺，而且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和对外贸易，使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结束了近代屈辱的历史。但在对外开放方面，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既有宝贵的经验，也有沉

痛的教训。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曾指出：“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可是在建国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采取了敌视和封锁的政策。后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又单方面终止了与我国签订的经济合同。在这样的国际条件下，加上我们自己“左”的思想错误，片面地曲解了自力更生的方针，阻碍了我们的对外开放。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将开展对外经济活动斥之为“出卖资源”、“卖国求荣”、“洋奴哲学”，把经济孤立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我国除了少量的外贸和外援外，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几乎完全中断，中国几乎完全与世隔绝。所以，建国以后，我国虽然把对外开放作为进行经济建设的基本政策之一，但由于五十年代美国的封锁和六十年代苏联的压抑政策，我们是被迫在与外界隔绝的条件下进行建设的，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种情况助长了忽视对外经济交流的观点。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实际上并没有把对外开放提到应有的重要位置。

对外开放的政策，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下来的。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提议，确立了我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重大战略方针。全会公报指出：“在自立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从此，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结束了自我孤立的封闭时代。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规定：“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作为加快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措施。”这表明，我们党对实行对外开放的认识更深刻了，把它提到了基本国策的高度。

对外开放作为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它的内容和形式包括：对外贸易、对外资金交流、对外技术交流、建立经济特区、多边合作、对外旅游、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等。从对外开放的内容和形式看，它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第一，利用外资，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我国经济建设的一个突出困难就是资金不足。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资金甚大，能源交通、基础材料工业建设的任务非常繁重，但国家财力有限，已经安排的这些重点建设规模偏小。文化教育、科研的投资更短缺。这种状况如不改变，经济的持续发展必然会影响。而利用外资则是一条出路。据统计，当前世界上约有八千亿美元的游资和银行存款在寻找投资场所。而我国市场巨大，对外资有巨大的吸引力。

第二，引进先进技术，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我国经济建设的另一个大的困难就是技术落后，大概要比发达国家落后二十年至三十年。我国现在有四十多万个工业企业，大部分企业机器陈旧，工艺落后，技术改造任务十分艰巨。如果闭关自守，一切靠自己从头摸索，那就必然要走弯路，贻误时机，使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引进先进技术则可以缩小这个差距。

第三，扩大对外贸易、互通有无，占领国际市场，增加外汇收入。积极扩大对外贸易，一方面我们可以与世界各国互通有无，通过外贸进口一些先进技术装备和短缺原材料，

保证我国重点项目和经济薄弱环节的生产建设。另一方面也可以占领国际市场，促进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加外汇收入，以此增加国家的国际支付能力。

第四，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方法，提高我们的企业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我国不仅技术落后，管理也落后，特别是缺乏经营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经验。已有几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组织和管理社会化大生产，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和经验，我们有必要从中吸取、借鉴对我们有益的东西，组织好社会化大生产，提高我们的企业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总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需要，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

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它给我国的国民经济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是沿海开放地区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成为我国和亚太地区最具活力的经济发展区域之一。自1979年以来，经过十多年的艰苦探索，我国先后创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省五个经济特区；进一步开放了大连、天津、上海、广州等十四个沿海城市，开辟了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以及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开放区；1990年中央又决定开发和开放浦东新区；对内陆周边国家的开放也正在逐步展开，形成了包括不同层次、具有不同开放功能，由沿海逐步向内地梯次推进的开放格局。这其中特区发展最快，1991年五个经济特区工业总产值达到五百四十三

亿三千万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八点八；外贸进出口总额达一百九十六亿七千万美元，而创建初期仅一亿二千万美元。十四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已进入产出大幅度增长的发展阶段，1991年工业总产值达一百八十四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九；外贸出口额达十一亿四千万美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六。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在对外开放的推动下，经济更具活力，其辐射力、吸引力和综合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二是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卓有成效。截止1992年9月底，我国批准兴建的外商投资企业近六万家，外商投资协议金额八百二十亿美元，实际引进外资三百亿美元。除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外，为了解决我国建设资金不足，我们还利用了国外贷款，至1992年7月底，利用国外贷款六百七十二点二亿美元，实际使用五百六十六点八亿美元，其中绝大多数都用在国民经济急需的生产建设项目上。利用外资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加强了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了基础原材料和高新技术加工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利用外资的同时，还引进了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力地促进了技术进步和产品、产业结构的调整，使我国的汽车、电梯、计算机、彩电、家用电器、机床设备、通讯器材、日用百货、建筑材料等在产品和制造技术上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三是外贸有了飞速的发展，增强了我国的国际支付能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对我国外贸体制进行某些改革的基础上，1988年后，国务院对我国外贸体制又进行了两次重大改革。改革增加了对外贸易的活力，使我国的

外贸出口每年都上一个新的台阶。据统计，1950年至1987年我国出口总额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一点八，而1988年至1991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五点一。我国出口贸易在世界上的地位也由1978年的第三十二位，上升到1987年的第十六位，1991年的第十三位。1991年外贸进出口总额达一千三百五十七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七百一十九亿美元，都比1978年增长五倍以上。我国外贸的飞速发展，使我国国际收支平衡有了根本的改善。1978年底，我国外汇结存仅为一点六七亿美元，1986年底，也只有二十点七亿美元，1990年底为一百一十点九亿美元，1991年底为二百一十七亿美元，加上银行的外汇资金和存款，超过了四百五十亿美元，增强了我国的国际支付能力。

总之，十四年对外开放的事实雄辩地证明，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对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综合国力，扩大我国对国际经济的参与度，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它是古老的中国经济腾飞的必由之路。

近代的思想启蒙运动与本世纪 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

启蒙运动，是指通过宣传教育使社会接受新知识而得到进步的运动。就世界范围来说，是指十七至十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民主文化运动，其目的在于启发人们打破中世纪的黑暗，亦称“黎明运动”。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前，法国进步思想家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孟德斯鸠等积极推进了这一运动。他们主张破除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从资产阶级变革的现实要求出发，在哲学上继承和发展了十七世纪英国的唯物主义思想，对基督教神学和各种唯心主义学说进行了批判，崇尚和宣传无神论；在政治上主张剥夺封建贵族的特权地位，建立开明专制制度或民主政体。十八世纪下半叶，德国进步思想家莱辛、赫尔德、席勒、歌德也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蒙昧主义进行了批判，提出并强调人道主义、政治自由。在十九世纪，俄国的别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斯基等俄国启蒙运动者创作了和发表了大量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政治和文艺作品，反对沙皇农奴制度，倡导民主和人权，构成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中国近代历史来看，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所主张和宣传的反对封建专制、主权在民、自由、平